

从“总体史”到“三时段”

——一个解析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新视角

高尚 王四达

内容提要 “历史学重回‘长时段’研究”是最近史学界的呼吁;对研究社会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传播问题来说,该理论也是一种合适的分析工具。通过“总体史”与“三时段”理论的结合,可以构成一个“点”、“线”、“面”、“体”的有机整体;借助中国历史的“三时段”和世界历史的“长时段”这双重视角,可深入解析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过程中重要事件、客观情势和社会结构的特殊作用;可以揭示这一思潮在中外历史时段中双流汇合的关系,由此推进了对该问题的立体解读。但是,“总体史”与“三时段”理论毕竟只是一种学科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才是解析这段历史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三时段”理论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 “长时段”研究

高尚,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362021

王四达,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362021

2016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一文指出:最近,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大卫·阿米蒂奇等模仿《共产党宣言》,出版新著《历史学宣言》,呼吁推动历史学抛弃过于碎片化的研究方式,重回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提倡的“长时段”分析,以便更有力地解释当下的现实问题^[1]。例如,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就是一个“当下的现实问题”,它关系到中国为何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然而如果从学术界的角度看,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研究,仅有理论上的深入领会是不够的,还要有学术上的扎实研究,才能“有力地解释当下的现实问题”。就“长时段”理论来说,它的问世已有数十年了,但时至今日著名学者还在作此呼吁,可见史学界习惯于旧方法的局面还没有改变。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长时段”理论即传入到中国,但基本停留于介绍层面,把它具体应用于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上迄今仍相当罕见,当然也没有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一研究领域中来。有鉴于此,本文将尝试把“三时段”理论纳入“总体史”大框架之中,使短、中、长“三时段”与“总体史”组成一个“点”、“线”、“面”、“体”有机整体,以加深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立体解读。

[1]周兵等:《历史学缘何重回“长时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21日第1版。

一、“总体史”与“三时段”：解析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新工具

“总体史”虽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重要学术主张之一,但并非该学派首创。在这之前旧史学代表德国兰克学派就非常强调历史研究要有“整体史”的视野。兰克本人尽管很重视对史料及细节的甄别,但他还是坚决反对那种“堆积历史特殊事件的做法”,指出“那些把历史仅看作是特殊事件的大叠加的历史学家肯定是错误的”,特殊事件、细节研究虽有其本身的价值,但是当历史学家“思考特殊性时,作为普遍性的世界的发展也将在他面前展开。”“在精确之上求整体理解永远是一个理想的目标,因为这要求对人类整体史有一个极其透彻的了解。”只有在这基础上才能作出深刻的、有穿透力的研究。因此他主张要在纵横交错的网络中把握一个特殊事件,即在时代精神和社会联系、民族交往、或国际关系中考察该历史事件所受到的综合影响,这使“整体史”的研究超越该国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视野。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封闭的。正是有那种依赖于该民族的特性的外部交往才使一民族登上历史舞台的”。因此,研究这个国家的问题也就不能不了解与之相联系的相关国家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性的主流文明开始形成,“一些国家先于其他国家有这种力量,并对其他国家施加显著的影响。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变革,无论好还是坏,主要起源于这些国家”。为此兰克认为,“我们应关注这些国家对其他国家所施加的影响,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战争和和平中他们的发展”^[1]。显然,近代西方对东方(包括中国)的殖民扩张就是这样,社会主义学说从西方传入东方并产生巨大影响也是这样。

应该说,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该学派创始人之一马克·布洛赫有一句名言:“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在他看来,“无论什么性质的社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概莫能外”^[2]。年鉴学派认为,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总体”,作为总体的人类社会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组成,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了多层次的结构。所以历史研究的对象就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构成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总体史和综合史^[3]。

在强调“总体史”的基础上,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又进一步提出一个“三时段”的史学理论。他敏锐地看到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故主张用不同的时段概念来准确把握历史现象,由此揭示了不同层次的历史时间在总体史研究中的意义。在他看来,政治、军事、外交等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只是一种“短时段”,在“短时段”发生的那些喧嚣一时事件背后,必定有一个能说明其前因后果的“中时段”局势在起作用。“中时段”是一种新的历史时间和历史叙述方式,即所谓情势、周期和循环过程……供我们选择的时间不是一天或一年,而是10年、25年或50年乃至10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中时段”的历史波动虽然构成了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的基础,也塑造了历史的面貌,但它还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真正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结构是一种网络构造,一种长期延续的实在,诸如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支撑或阻碍着历史(心理结构即精神状态也可以被视为结构)。因此必须从稳态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的形成去把握历史的“长时段”,探寻历史长河的基本走向。布罗代尔认为:“(结构)这一概念对处理长时段历史观念的问题非常重要,对社会的研究者而言,结构意味着组织、一致性、社会实在和社会团体之间一套非常稳定的关系……一些特别长命的结构已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它抗拒历史

[1][德]兰克:《论十九世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6-228页。

[2][法]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137页。

[3][法]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王建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的进程,也因此就决定了历史的流动。”^[1]虽说这种结构在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生存过程中都可能是看不到的,它很缓慢地发展着,甚至可以理解为接近静止的时间运动,但它与中期的渐变及短期的激变之间又是密切关联和相互作用的,三者可以构成三种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对短时段事件的研究必然要求对中时段作情势的探析;而对情势的了解又必然要求对长时段的社会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性质的总体把握。反之,只有对社会的基本性质和长时段的基本走向作整体通观,才能加深对中时段的特定局势的认识;而认识了中时段的基本状况,则能深化对短时段的事件个案的理解。由于“所有‘现在的事态’,都是具有不同起源和节奏的运动复合体,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也始于遥远遥远的过去”^[2]。所以布罗代尔认为,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研究是这样,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研究也是这样。

其实,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和“总体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并不对立,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因为唯物史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长时段”和“总体史观”。马克思的总体史观虽然来自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但他不像黑格尔那样把“总体性”理解为包罗万象的精神性的东西,即绝对精神,而是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用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来解释社会的整体性,以实践理性作为解决历史之谜的钥匙。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总体是总体性辩证法在历史领域的表现,也是历史不断实现为世界历史的过程。正因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把“总体性”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哲学的决定性区别不在于解释历史时给经济以首要地位,而在于“总体性”,即总体对局部的决定性,局部脱离总体是不可能孤立发挥作用的。就这一点而言,它与兰克学派及年鉴学派颇有相似之处,所以年鉴学派第一、二代人均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他们的史学理论的来源之一,第三代代表人物勒戈夫也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关注长时段和整体史。当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相比仍有各自的侧重点,马克思要建构的是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着眼于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其特点是既宏观又深刻,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中观、微观方面则有所不足。而年鉴学派关注的则是史学理论和学科方法,“三时段”结合“总体史”的意义在于把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分解为三种不同的时间节奏,点、线、面、体的不同观察角度可以使同一条“山脉”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特殊效果。显然,二者之间是可以互补的。

二、中国历史的“三时段”: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三重视角

“总体史”与“三时段”理论对研究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问题之所以有其适用性,是因为这个问题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深层危机与变革探索密切相关。在此之前,尽管几千年来中国发生过许多改朝换代,也有过多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如鲜卑、蒙古、满清),但从来都只有政权的危机,而不存在制度与文化的危机,因为华夏的制度文化总能反过来征服入侵的夷狄,使他们服膺“孔孟之道”,所以国人始终坚信只有“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但具有总体史眼光的马克思在论及英国对文明古国印度的征服时却高瞻远瞩地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这使得印度文明影响不了他们^[3]。无独有偶,近代中国也遇到与印度相同的难题:他们面对的“洋夷”已不再是中世纪的蛮族,而是发展程度远超中、印这些古老文明的现代国家。中国古人“用夏变夷”的招数遇到这种有着较高文明的“洋夷”不但不灵,而且还面临被他们“用夷变夏”的危机。中国近代史

[1][2][法]布罗代尔:《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引自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808页,第8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表明,在马克思揭示的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面前,不管顽固派如何抵制“洋夷”,中国还是随着危机的逐步加深或被迫或主动地走向“用夷变夏”的制度变革与文化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还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归根到底都是在危机的压力下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出路,三次政治变革就是三条道路的尝试,是环环相扣并逐级推进的。在这个道路探索的历史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关节点或转折点,有阶段性的局势发展动向,有深层的社会结构、历史传统的制约,这些不同的历史素材有不同的地位作用,须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来剖析。“总体史”和“三时段”的理论工具正可以把点、线、面、体提纲挈领地组织起来。

以社会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为例,一些“短时段”的事件无疑具有历史的里程碑意义,甚至是启动下一段历史进程的枢纽。短时段事件可能不少,但因各自的重要性不同,对其重视的程度也应该有所不同。在本文涉及的范围内,最重要的短时段事件首推1840年鸦片战争。从表面上看这虽然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并无直接关系,但它是中国近代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开端,没有这个开端,也就没有西风对中国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反应,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播种、发芽、生根、开花。鸦片战争就是先进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起点,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他们通过先进的西方文化看到的未来。其次是甲午战败。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前50多年的时间里,国人对西方文明一直停留在“师夷长技”和“中体西用”肤浅认识上。甲午战败这个短时段事件的震撼成了国内掀起文化启蒙思潮和社会变革浪潮的契机,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在这波时代大潮中涌现的。再次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个短时段事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既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从此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力量;又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此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结在一起。

上述短时段的事件虽然因其具有标志性和震撼力而引人注目,但构成短时段事件发生、发展基础的却是中时段,如果不结合中时段的局势,就难以凸显短时段的意义。布罗代尔就善于分析某一时段的人口增减、价格波动、商业兴衰等各种情势,以揭示地中海地区某一经济周期的历史。这种中时段局势的把握对分析鸦片战争爆发原因非常合适。战争之前已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迫切需要拓展海外市场,但在中英贸易关系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英国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势,无耻输入鸦片以掠夺中国白银,于是有了虎门销烟与战争爆发。马克思也从19世纪中叶的中英贸易关系来分析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而预见战争的结果与形势的走向,就其史学方法而言也属于“中时段”的应用。至于中日甲午战争则分别有中、日两个“中时段”可以考察。日本自1853年被西方打开国门后,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做出深刻反思,1868年即进行“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明治年间,在日本发生的势如破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变革够得上一次革命”^[1]。经短短20多年一跃而成为东亚强国。这是日本崛起的中时段。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的“中时段”可以国人的觉悟过程为界。20世纪初陈独秀曾把这个过程归纳为从“学术觉悟”(指科技的)经“政治觉悟”到“伦理觉悟”三阶段;梁启超则把它分为“从器物上感到不足”经“制度上感到不足”到“文化上感到不足”从而“要求人格的觉醒”三期。其中从第一期到第二期国人的觉悟特别艰难,即使经历了多次屈辱的战败,保守派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连开明派也满脑子的“驭夷”“制夷”幻想,李鸿章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不过是火器万不能及。”^[2]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3]?不

[1][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3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52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页。

[3]《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知世界潮流与自己的落伍,不晓华夷差距的体用关系,更不懂蕞尔夷邦强盛之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真可谓既不知己亦不知彼,何能“制夷”?甲午惨败宣告了“中体西用”这条道路的破产,亡国危机激发了思想精英的进一步觉醒。从1895年起,各种以“保国”、“自强”为目的的学会、报刊、学堂、书局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被顽固派斥为“开处士横议之风”,其实它正是社会变革时代精英阶层开始独立、学术开始摆脱依附的表现。社会主义思想即在这个思想多元的时代传入中国。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救亡运动,但仅维持百日即以失败而告终。维新变法的破产,清楚地表明冀望于封建王朝自我革新这条路是不现实的,因此20世纪初革命派毅然抛弃幻想,选择共和革命。但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不休,社会乱象不止,如陈独秀所言,“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1],催发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迸发,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国人对西方文明幻灭,使深感共和革命破产的思想精英处于集体迷茫和焦虑之中。“十月革命”的爆发向急于寻求中国出路先进分子展示了一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十月革命的道路成为一种全新的道路选择,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表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由空想走向科学的革命实践。上述各时段可谓特征鲜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伟大意义,如习近平所说:“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2]不难看出,三个时段之间的内在关联就体现在这三个“深刻改变”之中。

除了关注“中时段”外,对中国近代变革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历程的探索,还要用“总体史”和“长时段”来解读,这就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从空间维度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宗法-政治社会的结构,它大致有如下几个要素:一个缺乏自力成长能力的、简单再循环的自然经济,一种一家垄断、一人独裁的专制政治;一套法古崇圣、墨守成规的思想观念;一种丧失自我、唯上是从的集体人格;一个外严夷夏之防、内讲尊卑有等的封闭社会,由此构成一个社会的横剖“面”。在布罗代尔看来,长命而稳定的社会结构是会阻碍历史进程的。从18世纪的亚当·斯密、赫尔德、到19世纪的黑格尔、谢林,甚至连马克思、毛泽东,均指出过中华文明长期停滞的问题。从时间维度看,数千年的华夏农业文明又可以分为先秦等级分权专制和秦汉后的中央集权专制两大段。前后虽有区别,但帝王专制却是一脉相传且不断强化的。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只有“一种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4]不管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帝王的兴替,还是汉族、鲜卑、蒙古、满族等族群统治的更迭均为如此。上述这个社会结构面和历史长时段的结合便是中华文明的“体”。这个前现代的社会肌体,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理想明显存在着时代的落差,而这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一波三折的深层根源。

三、世界历史的“长时段”: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双流汇合

由于中国近代史、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发生在中西文明交往碰撞的时代,因此对它的研究又不能只停留在中国历史的三时段内,必须放眼西方历史的长时段才能对历史作出富有穿透力的分析。在西方资本主义作为全球性主流文明兴起之前,世界处于以儒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

[1]《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1版。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和基督教文明多元并存的“地区史”时代。布罗代尔指出：“在15世纪前，特别是在更靠前的各个世纪，人类被分割成不同的星球。各个星球庇护一种独特的文明或文化，各个文明或文化又各有其长时段的特性和选择。”^[1]16世纪前后，欧洲开始出现新时代的“胎动”，许多“短时段”事件汇集成文艺复兴、新航路开辟、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等几波“中时段”的历史运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商业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它就是一个“总体史”剧本。从结构上看，这个新生的资本主义文明包括：一个有自力成长能力的市场经济结构；一套公众能普遍参与的民主政治体系；一种以理性科学为特征的现代思想观念；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成熟公民人格；一个自由、流动的开放社会系统。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论及“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意义”时用“全球性”一词来概括该时代的特征：“新的全球性视野”；“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全球性的经济关系”；“全球性的政治关系”；“全球性的文化关系”等^[2]。于是，以前几大文明相对孤立发展的旧格局被西方一家独强的新局面所取代，由此进入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为特征的世界历史“长时段”。所以布罗代尔又说“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结构”^[3]。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正是和这个“长时段”相吻合的。既然“资本主义是一种长时段结构”，那么按照这个理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必然也是一种“长时段结构”，因此，对这个历史进程的研究当然也要放在世界历史的长时段中才能得到合理解析。

首先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是黑格尔。他把世界历史看作是绝对理念、世界精神实现它自身的过程，认为精神的实体是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世界历史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尽管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但由于中国社会后来的停滞，当历史的发展已进入欧洲时代时，中国（和印度）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只是“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生动活泼的进步”^[4]。所谓“若干因素”显然是指非中国自身所有的外来文化，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它能够促进中国的进步。应该承认这一看法有预见性，近现代西方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确实给中国带来了进步。

与黑格尔从他的思辨哲学出发去构建世界历史图式不同，马克思则从唯物史观关于事物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原理出发来解释世界历史的形成，进而揭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该链条大致包括如下的环节：生产力发展导致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民族交往扩大推动世界市场体系形成；西方对外扩张造成东方社会解体；资本主义的危机带来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最终将推动资本主义的走向共产主义。

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敏锐地看到近代以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他指出：“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对内，资产阶级打破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代之而起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对外，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又是经济全球扩张最具威力的武器，“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5]。由于资产阶级开

[1][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67页。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227页。

[3][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顾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2页。

[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拓了世界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各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无数的工人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末,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1]与狭隘的地域性的民族经济被开放的市场经济取代相伴随的,是民族的片面性文化也将被多元的世界性文化所代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2]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超越民族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性文化思潮,它虽然产生于西方,又必然走向东方。

对于西方入侵前的东方社会,马克思曾清醒地指出:“这种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3]然而,当这股世界历史的洪流冲击了中国这块“活的化石”(马克思语)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便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洪流之中,并带来了传统社会的解体与变革。对此马克思预言:“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持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4]即使腐朽的清廷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5]最终在中国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可以说“辛亥革命”既是西风冲击引起的社会革命,又是中、西两个历史“长时段”交集的结果。

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仍然是剥削阶级占有劳动、人们受盲目的异己力量支配的“史前史”,因此它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而是预示着新的历史时段的开端。马克思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照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分配劳动。”^[6]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残酷贪婪制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催生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启动了自《乌托邦》问世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段。在中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虽然瓦解了腐朽的封建统治,但他们所做的一切终究是受其贪婪的欲望驱使的。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西方在东方所做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7]。也就是说,发达的生产力必须归人民所有才能带来人民的解放,因此,东方国家还要把民族民主革命推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虽是一个“短时段”事件,但它为中国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既与中、外历史“中时段”密切相关,又是中、外历史的“长时段”双流交汇的结果。

四、结 语

应该看到,对于社会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的研究,年鉴学派的“三时段”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学科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才是我们解析这段历史的根本依据。近代中国虽然是落后国家,但不等于它不能接受和实践社会主义。从历史过程看,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精英孜孜以求的就是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为此他们经历过两次从文化幻觉到文化自觉的过程: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第542-543页。

[2][3][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第682页,第608、609页,第689页。

先从对民族文化的幻觉中觉醒过来,转向批判封建主义,追求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继而又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幻觉中觉醒过来,转向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弊端,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1]。然而,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有多大,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会受益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以中国为例,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墨子刻认为:“文化传播是一条双轨线,它同时取决于输入的观念的有效性和促成这种输入的内部刺激的广泛性。……希冀从形而上学的、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强烈愿望,引导许多中国人满腔热情地去献身于推翻他们原本所尊崇的制度而接受生疏的外国方式的事业。”^[2]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来自外国的事业,但在近代中国处于民族危机的困境中,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均平”思想、“大同”理想经民族思想精英的创造性转化,逐渐实现了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对接与交融,终于较好地解决了道路选择的问题。在清末民初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内思想界呈现出一种思想觉悟的加速度,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基于对反封建与反帝必要性的双重认识,终于确立了反封建与反帝的双重任务,成为中国打倒封建主义后很快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追求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

从理论依据看,落后国家在完成了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后,也不可能止步于此,它必然要把社会革命推进为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3]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在分析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消极后果时也指出这一点:“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4]所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中国的必然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均肯定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布:“共产党人到处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5]可见所有制发展程度不高的落后国家也应包括在革命运动之中。这是因为,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6]。即使在不发达国家,它们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也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7];虽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实领域都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阶级领导着这个运动并引导着所有的群众”^[8]。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论断经列宁主义的推进,到毛泽东那里终于发展成系统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为现实。

[责任编辑:肖波]

[1]参见高尚、王四达:《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演进路径》,〔北京〕《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2期。

[2][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颜世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第66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6][7][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0页,第685页,第567页。